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 讯

第 6 期（总第 390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22 年 6 月 5 日

-
- ◆ 我们的呼吁.....孙鸿良 岳绍先(1)
 - ◆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丁玉华(3)
 - ◆ 再展雄风，再创辉煌.....刘济民(6)
 - ◆ 洗大豆国耻，铸中华金碗.....那中元(8)
 - ◆ 齐黄 34 大豆盐碱地创高产.....周迎春(13)
 - ◆ 九号院寿星——怀念石山先生.....赵树凯(14)
 - ◆ 林占熺：把“中国草”种在黄河边.....朱立杨(18)
 - ◆ 根除左倾思潮影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郭书田(21)
 - ◆ 原农业部老部长何康一份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张蓝水(25)
 - ◆ 只有人、地、村整体联动，才能破乡村振兴这个局.....刘守英(27)

我们的呼吁

孙鸿良 岳绍先

最近我们得知山东、河南等省的小麦部分产区有切割小麦青禾作为青饲料出售现象，虽然得知主要原因是由于今年气候反常，播种期延后及多雨、低温等致使小麦成穗率低而使农民看不到希望，但总的来看国家缺乏青饲料是制约畜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此，我们作为一个科技人员，认为赶快找到青饲料出路是重中之重。出路之一就是速种我们从事 40 年研究的籽粒苋，以它的青饲料喂饲途径是可行的，而且籽粒苋青饲料有如下 5 大优点：

一、抗逆性强

耐旱、耐盐碱、耐水土流失，因此种植选地不限，可以在以东营为主的沿海滩涂、黄河沙化故道以及水渠边、宅基地等地种植，而不必在正式耕地上种植，并可通过种苋 3 年以后可使一些非耕地改造为可耕地。

二、生长速度快

三个月可使一亩地生产青饲料 10-20 吨，有“给我三个月，还你一片林”之称。

三、营养价值高

青饲料粗蛋白含量以 15-21%。

四、适口性强

已试喂猪、牛、羊、鸡、鱼、貂等皆喜食。

五、播种量极低

籽粒苋每亩播种量只需 10-15g，我们可以帮助调拨数百万亩的种源。

我们是退休科研人员，作者之一曾在北京大学攻读植物生态学副博士学位，导师为李继侗院士。在作物所 40 年一直从事农业生态与籽粒苋开发的研究，我们曾主编“籽粒苋在中国的研究与开发”等三本专著，在“中国农业科学”、“中国畜牧业”、“中国饲料”、“草业学报”、“中国种业”、“中国生态农业学报”等发表论文共 60 余篇，代表作：“籽粒苋高产抗逆特性及其开发的优质高效青贮饲料的关键技术”，“创新技术带来籽粒苋优质青贮饲料面世”、“籽粒苋饲料喂饲畜禽的增产、节粮的双赢现象及其营养功能效应”、“他对籽粒苋发展前景早有论断一纪念于光远《籽粒苋对我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一文发表 23 周年”等。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2022 年 5 月 15 日）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在农业农村部离退休干部读书会成立 10 周年

暨读书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

丁玉华

同志们！过去的一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12—2022 年，是我们部离退休干部读书会成立 10 周年。这 10 年，正是我们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了新时代。这里有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这里有新时代领路人的深邃思想和崇高风范，这里有中国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十年见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十年见证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的丰富发展，十年见证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真挚情怀，十年见证上下同心、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而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诸多风险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中国兑现了承诺，向动荡的世界展示了团结的力量。世界对“中国办事，大可放心”的印象再次得到增强。

成立部离退休干部读书会，继续为“三农”事业作贡献。在部党组、部领导的关怀下，在部离退休干部局领导下，以部系统原有的 10 个读书组的基础上，于 2012 年 4 月成立了部离退休干部读书会。到 2022 年今天已经 10 年了。目前读书会的读书组增至 15 个，成员 239 人。

读书会的创立，是党的老干部工作贯彻落实党中央“老有所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精神的一次创举。

一、坚持个人读书与集体交流活动相结合

在个人读书的基础上，对读书中的重点、热点问题，如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四个意识、五大发展理念、乡村振兴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疫情防控等问题，进行小组或大组讨论。在离退休干部局的统一组织下，于 2013 年 11 月，举办了公安部、交通部、农业部三部委老干部读书交流会。随后，在以上三部委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教育部、中科院，举办了五部委读书交流会。两个大型读书交流会开得很成功，效果很好，影响很大。

和平里活动站读书组于 2001 年成立，已经 20 年了。每月小组讨论一次，头几年每月活动两次。读书组对如何读书深入地进行讨论。大家认为，读书是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手段，是人类吸取精神

能量的重要途径，也是一种重要的修身方式。通过读书我们可以陶冶自己的高尚情操，培养自己的高尚人格，孕育自己的高尚品味。我们可以从读书中获得人生智慧，使自己达到一种与天地游、同古今心的人生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把学习型放在第一位，是因学习是前提，学习好才能服务好、学习好才有可能进行创新。”他还说：“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是自己的事，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这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十八部分的一个小标题。书上写道：“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读书会的同志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认真读书，好学上进，坚持学习和实践走向未来。

二、坚持读书与参观调研相结合

十年来，读书会参观了中国电影博物馆、首都历史博物馆、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参观考察了北京市改革开放典型大兴区窦店，参观考察了昌平区郑各庄村，该村当时被誉为“北京最美乡村”。村支部书记黄福水给我们作了介绍。他曾受邀到美国哈佛大学作了“创新求实”的演讲，这是中国农村支部书记在哈佛讲坛上第一次亮相。

和平里活站组织读书组参观考察了长城桑干酒庄，这是国家级的葡萄酒厂，位于美丽的桑干河畔，出产特定高级葡萄酒，已作为“国宴”、“国礼”招待贵宾和馈赠国际友人。我们参观了古今中外的葡萄酒展览，品尝了葡萄美酒，并到葡萄园进行采摘。此地是全国著名的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地区。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我国已被列入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有 11 个项目，位居全球之首。11 个项目中就有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

三、坚持读书与撰写论文、建言献策相结合

部离退休干部局在党和国家重大节日和重要活动时，举办优秀征文活动，众多读书会成员积极参加。如，2015 年举办农业部老同志“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优秀征文活动，由农业部离退休干部局编辑出版《优秀征文选编》。2017 年举办农业部系统离退休干部“畅谈十八大以来变化，展望十九大胜利召开”优秀征文活动；2018 年举办农业农村部离退休干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优秀征文活动；2019 年举办农业农村部离退休干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征文活动；2021 年举办农业农村部离退休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征文活动，以上几次征文都编辑出版了《优秀征文汇编》。

举办这样的征文活动非常好，每次都能调动数百名老干部（其中有数十名读书会成员）参加。就说这次庆祝建党 100 周年征文活动，共收到稿件 152 篇，评选出 60 篇获奖，通报表彰。其中读书会成员获奖者：一等奖郭书田，二等奖王相柱，三等奖张毅，优秀奖庞志谦、赖瑞华、丁玉华等。我每次征文活动都参加了。很幸运，每次都获奖了，最好的一次是荣获一等奖。

另外，2013年农业部直属机关党委举办“辛勤耕耘为小康”征文活动，有一些读书会成员积极参加并荣获一等奖。

和平里活动站读书组赖瑞华2017年编著的《中国闺阁诗词荟萃》一书，40万字，是一部我国历代闺阁女性诗歌集。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全国发行。读书组每人一本，引起了大家阅读古典诗词的热情。

读书会还邀请了国防大学军事专家讲述台海和南海问题，邀请北京市朝阳区诗词协会学者讲解中国诗词，也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讨论。

大家认为，古典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唐诗、宋词、元曲更堪为其中三绝，千百年来光耀人间，滋润并哺育着华夏代代儿女。学习它，既可陶情冶性，更会令我们开阔视野并增长学识。突然使你眼前一亮：那“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哲理是何其深邃，那“春风吹又生”的野草又何等顽强！

跨越时空，你将与大师交友，倾心直面。了解诗仙的傲然洒脱，诗圣的忧国忧民，才子杜牧之风流倜傥，国相文天祥至死不渝的高风亮节。

读书会成员积极为“三农”发展建言献策，参加了“我为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战建言献策”活动。论文纳入《论文集》中。特别是东大桥活动站读书组郭书田等同志，多次就“三农”发展问题向部党组以及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建言献策，受到重视。2021年，他编辑出版了《郭书田研究文稿》第28卷，共476页。其中就包括《给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信》（2021年5月9日），《给中共中央对台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信》（2021年12月9日），就“实现台湾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七条建议。

和平里活动站读书组的活动很兴旺，大家盼着读书交流活动这一天。一是活动站和总支领导重视，总支副书记赖瑞华、支部书记郭士勤和支委张复荣、张书华等多年为读书组成员。二是有一个好组长，原部办公厅副主任（正局）应曰连，从2001年4月读书组成立，到2017年一直任组长。他多年主管部系统农业编辑出版工作，经验丰富，水平高，人缘又好，大家都愿听他的发言，每次都有新意。这样的好组长实在难得。现任组长刘忠（支部副书记），认真负责，朝气蓬勃，能力强。抗战老兵张文庆在会上背诵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全文，博得全场掌声。宫玉祥、阙爱华夫妇到日本探亲，在读书活动那一天，他们从日本打来电话请假，并介绍了日本情况。张书华到加拿大看望在那里上学的孙女，在读书活动那一天，她从加拿大打来电话，用手机视频和每个人交谈，大家都非常高兴。

张复荣读书看报笔记记了一大本，她结合回乡江苏探亲观感，大谈家乡改革开放和翻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因疫情严重，按规定暂停一段集体活动，但大家用手机视频或在网上交流读书学习情况。

万里河山，春风浩荡，生机盎然。今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我们党将召开二十大，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在新的征程上，凝聚奋斗力量，书写新的华章。

（作者：农业农村部离退休老干部，2022年3月22日）

再展雄风，再创辉煌

——在华西村农民丰收节暨建村 60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刘济民

今年的农民丰收节，喜逢华西建村 60 周年，可喜可贺！我向华西村的父老乡亲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受《信仰》一书的作者纪硕鸣先生的委托，向大家表示问候！向大会、向华西村的父老乡亲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今天的大会开得庄重热烈、生动活泼、别开生面，特别是大会的颁奖、交接旗仪式，组建三个党建联盟的签约，以及各位领导和各界代表的发言，都特别生动感人！让我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了 60 年的华西村依然朝气蓬勃，依然风华正茂！华西有希望，华西大有希望！

华西建村 60 年了，其中我同吴仁宝老书记交往三十年，我追随华西村、关注华西村四十年。这几十年，我非常真切地见证了吴仁宝老书记和协恩书记团结带领华西村的共产党员和全体村民，成就了宏大、丰厚的华西富民大业、华西伟业。60 年前那个特别贫穷落后的小村庄，早已摆脱了贫穷、全面建成了小康，正在奋力建设高水平、高质量、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乡村里的繁华城市，城市里的美丽乡村。人们称之为华西奇迹、天下第一村，名副其实。

60 年了，华西究竟是如何由穷变富、由弱变强，如何实现物质、精神双富有的呢？我认为有四条基本经验。

一是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这一条很鲜明，很坚定，不断有新的创造。比如今天成立的三个党建联盟就是很重要的创造。

二是有吴仁宝、吴协恩为全体村民的共同富裕日夜操劳、忘我奉献的两位很好的带头人。

三是有一个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的强有力支撑。这一条从来没有动摇，丝毫没有动摇，一直在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创新。

四是实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完美融合、相互促进，形成了对华西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最稳固、最强有力的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华西村党委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定信仰，坚守信念，坚定不移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9 年 7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协恩书记说：“华西村乡

村振兴搞得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份量很重。这既是激励，也是信任，更是厚望。我看，华西乡村振兴搞得好，好就好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各个方面的全面振兴，是高水平、高质量的振兴。

在奋力前行的征途中，并不一帆风顺，并不是平坦无垠。山高路远，前程多险。创业难，守业更难啊！我看，比守业更难的，是在原有的非常好的基础上再去创造更为辉煌的业绩，那更是难上加难啊！

在奋力前行的征途中，遭遇挫折艰难怎么办呢？

我看，还是要学老书记。

吴仁宝老书记一生中遭遇的挫折和艰难接连不断，其中最大的挫折至少有三次。老书记说：“面对挫折，我始终坚持一条：实事求是。”老书记在挫折艰难和严重困难面前，不消极，不埋怨，不逃避，不泄气；他是百折不挠，实事求是，勇敢面对。我们就是要学老书记在挫折和艰难面前吓不倒、难不倒的那种顽强的、大无畏的精神！

我恳切希望协恩书记和党委一班人：绝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和各级领导同志的厚望与支持！

我希望你们真正认清华西目前面临的更为严峻的形势和更为激烈的竞争。

我希望你们真正认清和实事求是地面对目前所遭遇的挫折与艰难。

我希望你们真正认清进入新时代你们肩上所担当的更为重大、艰巨的历史使命。

我相信协恩书记和党委一班人，一定有胆识，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实事求是地解决好目前所面临的严重困难。

踏破艰险，迎战风雨，扫除万难，再创辉煌！

我恳切希望协恩书记，更加紧密地团结带领华西村的共产党员和全体村民，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弘扬吴仁宝精神，凝聚新时代华西精神，以六十周年庆典为新的起点，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为坚定的步伐，为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百折不挠，奋勇前进，再展雄风，再创辉煌！

刚才看到华西新老战斗队的交接旗仪式，我又想到了老书记。2003年7月，在华西村党委召开的第六届党代会上，担任了四十二年村党支部书记、村党总支书记、村党委书记的吴仁宝老书记退下来了，他在党代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满怀深情、语重心长地强调：“华西人要一代强一代、一代胜一代；华西村党委要带领华西村民不断前进！”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华西的年轻人正在成长。我相信，华西人一定像老书记深情期待的那样：一代强一代，一代胜一代！

华西必定有希望，华西必定大有希望！

（作者：国务院原副秘书长，2021年9月23日根据录音整理）

洗大豆国耻，铸中华金碗！

应该、必须、能够，作为中华民族健康振兴第一基本国策的选择

那中元

万物生长靠太阳！

是地球生命永恒的真理！

能动抗争、双策竞择，是生命存活、进化、繁荣的求实战略准则！

“双策诸促高光效！”

是人类“逆向创造新条件，深广和谐大自然，高效利用多因素，人类家园持续美”的最佳尖端科学技术大成！

有纲举目张的科技方向途径和系列新平台为基础，“洗大豆国耻，铸中华金碗！”就“应该、必须、能够”承担起做为健康振兴中华民族第一基本国策的重任！

解决近乎绝无可能的急迫需要与革命振兴可持续，必须树起可凝聚万众一心的正确基本国策大旗！从2016年开始的大豆振兴重金豆补，到今年国家更前所未有的号召和重金粮补，虽体现了对急需的重视，但尾洋跟进的严重同质化等等，从科技上，就不可能解决中国“五大急迫”：

一、以大豆国耻为代表狂进口折国产十多亿亩农产品急迫的需求，

二、更不可能解决农业生产污染恶性循环为源急需的治理。

三、扩延放大的相关九个层面（土、水、气、环境、生物多样性、健康、社会矛盾、最佳碳中和、科技振兴国家）的污染直接和相关互促的一系列恶性循环难题的急需治理。

四、比低效率更高、普及需相关设施巨投资、污染转移、后延、扩散，为子孙后代挖巨坑的大电瓶汽车，是权宜一下，还是坚持做权经？！

还是支持生产力革命跃升的生物质能源汽车源程解决系统矛盾？！

五、碳达标、碳中和目标的基本策略，是尾洋限制生产力的被动退缩战略，还是支持中国创新生产力革命跃升的生物质能源生产用碳、应用中促全面自修复、优循环中美人类家园的能动进取战略？！

这“五大急迫”看似不可能和谐解决的污染恶性循环难题，却完全能够在“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用生命真理引导科技创新革命的“纲举目张”，在举合良知众力为实现“洗大豆国耻、铸中华金碗”目标的过程中体现，在达标胜利完成实现！

洗大豆国耻：

必须是在不影响现有农产品生产产量条件下，每年能用最安全良循环模式，多生产出约十亿亩优质大豆！

铸中华金碗：

更必须是在与洗大豆国耻为相关基础，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综合互促的生产力革命跃升。是以“五层面（种质创新革命、模式创新革命、熟制创新革命、链接创新革命、生态圈优循环创新革命）创新革命”为新平台的尽快互促跃升，实现“最安全、特优质、超高产、佳链接、优循环”的生产模式，达到年多生产出不少于三十亿亩（包括生物质能源）的农产品！

能动抗争进取策略的生物工程新方向途径科技——GPIT：

为觅探“生命真理”和谐改造自然，研究应用“能动抗争进取本质，高效利用自然、深广和谐自然，逆向创新条件，攻克应用难关，改造美好家园！”

我们以：继承挖掘中华文明精髓中医药宝库，与学习、敬仰前辈艰辛奋斗历程和现代科技成就，力争择优融汇并有所跃升，开创的中国的生物工程新方向途径——GPIT，已历约三十八年的阳光风雨，且三十一年是在权势谋私用伪科学实质的披挂封杀，和真识兴国高士道义支持为主、生命真理不断倔强展示其能大用且非他流可比，在攻克世界几十年、上百年、几百年久攻无克难题艰辛中，在展示坚韧生命力创造美好新前景的反封杀矛盾环境过程中，在完善自创理论与实践方向途径互为探索和验证正确的过程中，逐渐由“双向抗逆高光效”，到“双层强势高光效”，已经升华至“双策谐促高光效”！相关应用，也已渐成“种质创新革命、模式创新革命、熟制创新革命”，正具向“链接创新革命、生态圈优循环创新革命”拓展展现出蓬勃生命力！

虽然科学技术研究创新永无止境，在乡土化大规模实践中，还会有很多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研究解决的问题，但基本需要相应难关已克，只要得到应有支持，其所开创的正确的方向途径，和几十年理论与实践攻坚克难经过了实践验证的经历和教训经验淀积，已经具备担起“洗大豆国耻，铸中华金碗”所必须的科技创新和应用完善发挥的先锋所具备的责任和能力：

一、理念理论创新解决实践难题

用中医精髓“整体理念、综合分析、辩证应用、具体施治”，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学习、剖析生命真理的历程。

二、创造培育新种质的方向途径

以“信息感受度和动力学机制可改变”为机理，强化生理代谢能力、高抗光氧化，乃至可控超敏应激等效应，用现代生命周期发育初始能飞速重演进化历程为契机，能量高效促强势表达为根本，努力与创新机缘巧合，可产生多种不同的超亲、强超亲的表达形式，有可累加递增乃至多层次表达性，不仅能产生巨大变异表达，甚至产生原来不具备的连锁超亲表达，有的将当代为潜性变异而在下代能远超亲变异表达！

非适宜乃至种植禁区的成功种植，且一茬一年生，变成可再生、可多年生，乃至表达出超强势应激可快速强势超亲的可进化性，……等等，都是原世界育种史上不存在可能性的中国原创！

三、这一人类创造培育新种质的方向途径，本质上是蕴含体现解释悠久生命历史中——为什么每次大灭绝，总有更大规模新物种多样性的大暴发，我们仅是冰山一角地极大缩短了其可暴发时间！

四、这是在探索、用好进化遗传，美好人类生活和谐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能用进化论的本质，完美进化论：

“能动抗争，高效应激，物竞天择，适进生存”！

五、这些理论、方向、途经的创新指导解决生产实践难题验证，在当代可控应激（超敏应激）表达可调控性的可极超强势表达，在多种作物上都可体现，特别是多年来在瓜类生产上的应激超强势反馈尤为显著，可生产出产量倍增、双倍增的优质农产品。

GPIT 生态农业的六大创新革命和急迫所需的支持：

一、种质创新革命

具超强势进化遗传表达新种质：

巨株双抗芝麻、小米；

多分枝双抗巨株蚕豆；

无光周期、光节律限制、双抗（多花穗、可柄萌生花穗）大豆等；

稻、麦、青稞、甜高粱等，超多蘖、超大穗、超优质、多年生、很高产；

甜菜、烤烟、棉花、油菜等高活性、能再生；强抗争、多年生，大巨株、超高产！

二、模式创新革命

一季作物区域，原春小麦、大豆（玉米），种质创新革命，春播改“冬播春出苗”及全套科技措施管理，加适当巨株油菜等新种质轮作，原来无解的恶性循环难题：

黑土地退化、冬水资源利用、春耕助大风扬尘等即可无成本解决。

更重要的是，我们无农药包衣，就解决了全世界用农药等想尽办法也无法攻克冬播春出苗的“粉种、霉种、烂种、冻损”难题，和小苗冻害难题，更进一步证明，我们三十年来生产上坚持 GPIT 种植的“六无”之一的无农药包衣，远胜源头破坏根面效应、土壤生物多样性、造成土壤污染退化重要根源的农药包衣。

科技创新替代，尽快停止农药包衣种，势可必行！

湿热同步高效利用：

窄行尺穗超密植：玉米窄行（30 厘米）一穴多株（4 株、5 株、6 株）超高密度（穴距 30 厘米）三角（错穴）种植，无地膜污染的（侧膜、侧膜裙边）种植！

宽畦大豆高固氮：

和谐了高产与高固氮悖论难题，经过 12 年努力，攻克了大豆光周期、光节律限制区域性难题；并产生了双花序、三花序、叶柄再生花序等突破。

2016 年大豆主产区低温冷害造成极严重减产降质，区内唯一 GPIT 技术多年大豆无包衣无施肥的万亩连片种植成为基本无减产无降质的亮点。

2018 年华北内蒙古等地高温造成大豆严重减产，甚至绝收。GPIT “窄行玉米高密植，宽畦大豆高固氮”模式种植却获超高产，成为某千万亩粮食农作物主产区市，大豆唯一获国家补贴的地块（因其他大豆种植户全部绝收）。在河南出现了株产 2700 多荚的超高产株。

三、熟制创新革命

（一）原一季作物春小麦区

春小麦春播，改成冬播春出苗。

有符合新农艺性状需要的农业机械配套，

新种质和相应管理配套措施，优质、高产且早熟 15-20 天左右，与具热激效应，和后期抗霜冻能力明显的种质，和湿热同步模式结合，多种植一季超高产耐冻青贮玉米，和特早熟大豆！

积温少于可种耐冻青贮玉米区或牧区及附近，可一穴多株（4~6 株）育苗，春麦收后，及时移栽种一季强耐冻（极限低温零下 20℃-24℃ 蔓菁块根不会被冻坏）、特优质、超高产的四用蔓菁等！

（二）原二熟区

1、有符合新农艺措施必须的农业机械配套

利用具苗期强抗冻玉米、大豆等新种质，玉米一穴 4（5、6）株育苗，起垄、窄行、侧膜（侧膜裙边）移植，宽畦高固氮大豆高产种植，收获一茬超高密度大棒高产干籽玉米。

2、用后期具抗冻性玉米种质一穴 6 株育苗，干籽茬玉米收获时，边收获，边就在原来垄上直接错穴移栽育好的一穴多株苗，按照 GPIT 模式管理，十月底、十一月初，收获超高产青贮玉米，及特早熟青大豆。

3、移植育好的强抗冻特优质、具高修复土壤能力的巨株油菜苗，或强抗冻白菜等。

4、对原蒜茬等，用好诱导调控技术，强化其抗冷耐冻、生长能力，使其既优质高产，同时又明显早熟 10~20 天，用上述 2、3，种两茬玉米（一干、一青，或两青）大豆，等等！

四、链接创新革命

超强分蘖（100-200 头甚至更多）的可再生青稞新种质、超高（株高 2.2 米以上）优质小米、高分蘖（10-15 最多 20 枝）巨株（1.6-1.8 米）优质蚕豆等，及其他前述无农药栽培优质秸秆、茎叶根块等的所有新种质新模式栽培的富含大量有益成分和元素的作物的有效利用，可显著提高饲养动物的抗病能力和繁殖、生长速率等。

源头解决了我国养殖业发展的四大瓶颈（过牧、过载、冬瘦春死、品质），和生态农业缺少无污染优质农家肥的悖性难题。

很安全、特优质、可针对性药食同源等的农产品，加速最佳利用，将成为无附加成本，源、程、生活环境的全面保障人民健康的新模式。

五、生态圈优循环创新革命

“八不争”、“六无”优质栽培佳链接优循环为主体的“能动阳光生态农业”模式，在“铸中华金碗”的过程中，就不仅能在实践能动进取战略系列革命过程中，自然解决现在的农业污染恶性循环死结，相关土、水、环境、空气就都能快速自修复为主体地进入优循环，就能无成本有效消减能源消耗等产生的必然污染。现在污染互促循环，治理高成本低效，按下葫芦浮起瓢，且带起渣的加剧整体恶性循环的怪圈，就能重大改善。

若现大量进口的不可再生能源和污染转移扩散后延等的其他模式的消耗污染，变为可再生生物质能源为主体，无可奈何的被动退缩战略产生的经济发展障碍，都可在生物质能源生产应用的自然良循环中自然消除。

农业生产源、程、链接为优循环，能源消耗污染变为促环境良好优循环。

这一生态圈优循环创新革命，使严重污染恶性循环的生产过程和环境，重新回归，并显著强化了其容纳、削减、利用污染物促良循环的“天职”能力。

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创造性解决碳达标、碳中和与经济发展能源消耗污染相悖死结的国家。中国农民和相关产业生产者，不仅年可多创造、节约、增效十多万亿的财富和几十万亿的价值，且能创造不可钱衡的更多健康、和谐、幸福环境。

为美好人类家园做出重大贡献，必将被全人类所尊敬！

六、急迫所需的支持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上述种质创新革命、模式创新革命、熟制创新革命等的科技重大难关均已基本攻克，展开规范示范就必须有符合全新农艺所需要的农业机械，才能保证新农艺基本正确实施到位，才能体现出革命创新的优越性，才能加速完成“洗大豆国耻，铸中华金碗”的重任。

请国家给予紧急支持！

相关示范、转化为生产力的推广，还需保证种质创新革命转换为生产力的规模化、模式安全化等保障需要。也请给予支持。

若国家能政策明确支持，并把引进国外生物工程科技所耗用的仪器、设备、资源、人、财、物资、项目经、专项经费等的十分之一，用于支持“洗大豆国耻，铸中华金碗”，中国不仅能够在 2032 年左右，就达到上述伟大振兴目标。

在海拔 1960 米的昆明基地“六无”种植“累加递增”产生新种质多年实践：优质油菜茎粗可达 6-9 厘米、株高可超过 2.3 米、单株最高产籽粒约 450 克；麦类超强分蘖，如青稞可达 100~200 多头或更多，能再生且表现出远超上代近一倍以上的显著大穗；水稻再生亦可表现出超上代的强分蘖、近倍超大穗。

抗冻再生成多年生的作物：

甜高粱或大穗或高分蘖（48 株）；甜菜单个 20 斤以上；棉花单株产籽棉过 450 克、单桃 9g（在元江基地 2014 年单桃超 10g）且衣分达 48~52；.....。

在此独有生理特性变异基础上，正在进行已初见成效的远源、超远源杂交攻关。

我们这些现有和还可创新的众多独有生理、植株、产量特性的不同作物、类同变异、不同层次、极其显著、方便重复、互为因果、极易于有的放矢地对照研究、可便于互为辅证，从各类显著变异，能找出基因、转录、蛋白、代谢、到表型改变等各水平的相关共同规律，特别是与诱导、调控，和环境，相互作用可产生的显著变化规律。是最好地完善解释遗传物质，与表型表达规律，又可用相关真实规律持续提升生物工程造福人类幸福水平的新方向途径。

而且能够用“有的放矢”为基础的最佳研究方向途径，完成“能动强势累加递增进化遗传”的相关研究，在完善包括“基因转座三不改写为三可”，为开辟攻克重大疑难病症无治等世界难题进行研究新方向途径等，同时完善进化理论的过程中，至少使中国成为生物工程新理论及应用的领军先锋！

（作者单位：云南省生态农业研究所，2022 年 3 月 9 日于昆明）

齐黄 34 大豆盐碱地创高产

周迎春

2021 年 10 月 18 日，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育成的蛋白脂肪双高大豆品种齐黄 34 在东营盐碱地专家实打亩产 302.6 公斤，实现大豆盐碱地单产新突破。

实打地块位于东营市垦利区胜坨镇海南村，总面积 760 亩，收获前土壤盐含量 0.3%。中国农业科学院常汝镇研究员等 5 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现场量取 1.2 亩面积，机械收获籽粒 363.2 公斤，不计田间损失，收获时已达正常含水量 13.5%，折合亩产 302.6 公斤。专家一致认为，在 2021 年东营市降雨多、涝渍重的情况下，齐黄 34 表现出良好的抗逆性，推广前景广阔。

齐黄 34 较好解决了大豆高产与优质、高蛋白与高脂肪、高产与抗逆等矛盾，同时在产量、品质、抗病、耐逆、适应性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先后通过国家黄淮海北片和中片、山东省、江苏省淮北和淮南区、贵州省审定，安徽省、河南省引种审批，是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和主推的四大核心品种之一。2020 年以亩产 353.45 公斤创全国夏大豆高产纪录。2012 年以来，齐黄 34 在山东等 11 个省市累计种植推广 3342 万亩，现已成为黄淮海地区推广面积最大的大豆品种。此次测产表明，齐黄 34 具有良好的耐盐性，在中轻度盐碱地可以实现 300 公斤以上的高产目标，将对优化我国滨海盐碱地种植业结构、保障国家大豆产业安全起到积极作用。

（闪电新闻记者：周迎春 报道。原标题：《302.6 公斤！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齐黄 34 大豆盐碱地创高产》。来源：齐鲁网，2021 年 10 月 22 日）

九号院寿星——怀念石山先生

赵树凯

一周前，石老走了，享年 107 岁。这些天常常想起他，心情颇不宁静。思绪飞扬中，品读他在一百岁岁时写下的“咏怀”诗篇，其中两句尤为拨动心弦。一句是：“一生傻气，和而不同；”另一句是：“书写心声警后世，和而不同更张扬。”

我曾经为石老做秘书服务六年。1982 年冬，那天正在值班室值班，处长对我说：“石山同志今天到，你到大院门口迎候，以后，他来我们这里工作，秘书工作由你负责。”那时，我 23 岁，他 67 岁。我为石老服务到 1988 年秋。最后一次去看望石老，是 2019 年春天。后来，他住进了医院。去年春天，疫情有所缓和，准备再去探望，医院依然不准。

石老是大学生出身的老干部，1936 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1938 年加入中共，是地下党支部书记，大学四年级时奔赴延安。抗战胜利后，他随军进东北，曾担任辽宁昌图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工作，1954 年调入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服务。谭震林随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农林办主任，主管农村工作到 1966 年夏“文革”开始。石老是谭震林最重要的“笔杆子”，刚内定提拔为国务院农林办副主任时，“文革”来了，谭震林被打倒，他被关押审查。恢复工作后，他在农林部工作，后来调任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委员会主任。再后来，被任命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来到九号院。

石老和我住一个大院。这个院原来叫万寿路 10 号院（现在称复兴路 61 号），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所在地，机关办公和家属宿舍都在这里。除了开会，石老通常不到九号院办公。我每周去他家里一到两次送文件。重要的工作内容是跟随他出差，调研时做记录、整资料、抄稿子。那些年跟随他跑过十几个省（区）。

我第一次坐飞机是跟随石老，那是 1984 年春天，从北京到桂林，飞机起飞后，他看到我兴奋好奇地向外张望，就把靠窗的座位让给了我。那是一次生态经济方面的会议，我们住在桂林榕湖宾馆原来白崇禧的别墅里，有几天，他埋头写稿改稿，我负责誊抄，休息时我们在榕湖公园散步。

我第一次坐长途汽车是跟随石老。那天，我们乘一辆上海牌轿车，早上从河南周口出发，晚上抵达安徽合肥，那时不仅没有高速，甚至像样的公路也不多，一路颠簸，尘土飞扬，轿车密封不好，我们两个都灰头土脸。晚上，省农委主任周曰礼请客，吃了清炖母鸡、红烧甲鱼，是一次难忘的美餐。周曰礼是安徽农村改革的“闯将”，功绩显赫而并未获提拔，以豪饮著称。那晚，他喝了不少酒，醉意朦胧，滔滔不绝，大谈安徽政坛。席间场景至今在脑海中活灵活现。

我第一次喝龙井茶是跟石老，他教给我泡茶的方法，还给我讲龙井茶掌故。他说当年随谭震林驻村

蹲点，就住在龙井茶原产地梅家坞村附近。有时候，他会从茶叶桶盒里倒一些给我。现在又是清明，新茶已经上市，又恰逢他过世，饮茶时情不自禁想到他。

我第一次进西单内部书店是跟随石老，内部书店有身份限制，凡能进去的人都有特殊证件，一般干部没有资格进，更没有资格买书。石老经常去那里，我有时候跟着去，我帮他拿书，他看过的有些书我也蹭着看。

最后一次跟随石老出差是1988年夏，我们先到呼和浩特，再到内蒙古西部伊克昭盟，而后经过毛乌素沙漠到达陕北榆林，再进入宁夏西海固地区，行程二十几天，我随他在草原上骑马，在蒙古包里喝酒，在沙漠里跋涉，在西部最贫困村庄座谈，每到一地，看的、谈的都是防风固沙、种草种树、小流域治理、生态改善。这次西部之行，印象最深的一次会，是他召集中科院兰州沙漠所专家，讨论怎样在沙漠里推广一种叫沙打旺的植物。

石老曾经指导我做研究。闲聊时我告诉他，我不愿意在秘书处工作，很想去研究岗位，但既无专业，又没有成果，我想多写东西，或者去考研究生。我自己写了文章送给他请教，他看了会谈些意见。他谈过的具体意见我已经不记得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多次对我说：如果喜欢做研究，就不要轻易放弃，不要想三想四，要坚持下去，坚持若干年就会有所收获。他讲他的经历，“文革”后本来上边安排去任国家农机部副部长，但他更愿意做研究，所以选择了中国科学院。

二

石老给我聊到过很多往事，聊家境出身，从上私塾到上大学，从入地下党到奔赴延安，从延安到东北，特别是聊中南海十几年的工作生活。

聊的最多是谭震林。他称呼谭震林为“老板”，他说，毛泽东也称谭震林为“老板”，那是因为抗战时谭震林领导新四军曾化妆成“老板”，他说毛泽东很喜欢谭震林，谭震林跟随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贡献很大，新中国成立后，推动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很得力。谭震林很会讲话，能讲大话，毛泽东有时候又称他为“谭大炮”。谭震林文化低，写批示有时文词不通，他要修改这些批示，也根据授意直接写批示。1958年全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是“老板”指派他最早前去考察，而后毛泽东派陈伯达前去总结提升，这成为公社化运动的起点。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政策，谈到人民公社的崛起和失败，他常常感慨多端，甚至痛心疾首，认为最深刻的决策教训是：“毛泽东听不进不同意见，其他人不敢坚持不同意见，上上下下都没有胆量说真话。”谭震林晚年曾经发表过一篇重要文章，是对主管中国农业时期的反思检讨，对农村政策的这个教训也有明确表达。这篇文章由石老执笔，他曾几次给我谈这篇文章的起草过程。

石老过的是典型学者生活。他对行政管理没有兴趣，对官场轶闻没有兴趣，对很多老干部热衷的社会活动也没有兴趣。他钟情于研究，特别关注生态环境和农村发展。他的朋友圈主要是学者或学者型官员，那些来往较多的有：侯学煜（植物学家，中科院院士）、马世骏（生态学家，中科院院士）、陶大镛（经济学家，北师大教授）、杨显东（农学家，曾任农业部副部长）、费孝通（社会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他们有时聚会拜访，也有时一起出差。他到地方调研，不论在省里还是在县乡，从来不讲场面上的套话，不讲文件上的大话，不打官腔，讨论的都是实实在在专门问题。我经常是晚上去他家，几乎没看到他在看电视，都是在书房里读书写作。

对很多人孜孜以求的干部待遇，石老总是淡然处之。他多年住在普通干部宿舍，也一直没有配备专

车，用车通常先告诉我，我再让车队派车。闲谈时我建议他想想办法，他说：“随便，让他们看着办吧。”他搬进部级住房、配备专车，是在明确副部长待遇七八年之后。而我知道，如果本人积极疏通争取，通常会比较快解决。按照规定，他坐飞机可以坐头等舱，因为那时买头等舱手续复杂，我往往自己做主买经济舱，但是他从来不过问，我买什么，他就坐什么。

“文革”期间，石老是出名的“硬汉”，至今很多农口老人津津乐道。他被批斗、被关押、被迫做检查，承认的事情始终承认，不承认的始终不承认，不像有的同事，检讨跟着“运动”变，这个运动这样说，那个运动那样说，紧紧跟着政治运动风向走。石老这种“耿介正直”，在农口机关中成为一种传奇。当然，他也不是从不低头，最有名的故事是：关押期间红卫兵让他钻桌子，要像狗一样的从桌子下边爬出去，他很顺从，做的很认真，爬出来以后还问：“这样爬是否符合标准？”红卫兵被他逗乐，反而温和起来。

当年初入九号院，石老并不算老，更“老”者大有人在，如张平化老，参加过北伐战争；如张秀山老，和刘志丹一起创建陕北根据地；再后边还有朱则民、杜润生、武少文、杨珏等，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参加革命。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九号院老人逐渐凋零，石老终于成为“最老”。在整个农业部门老干部中，在老一代三农学者中，石老之“老”，可以说登峰造极，无出其右。

石老不仅最“老”，而且“老”得很有生活质量。一百岁时，他还能自己出去买菜，也能自己做饭。上次我去看他，104岁的老人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时而有些激奋，笑声爽朗，透着孩童式纯真。闲聊中，他微笑着说：“在农业系统，原来最长寿的是金善宝和杜润生，都活到102岁；其次是朱则民，活到101岁。我已经超过他们了。现在，我每天上午下一次楼，推个助步车在院子里转一圈。下午我要干活，整理简报资料，做笔记”。那段时间，南美委内瑞拉国内正在闹动乱，报刊上有很多报道，他说的“下午干活”，就是把这些报道做成剪报资料，分类整理。他“干活”时神情专注而享受，就像小孩子做智力玩具，其乐融融。

三

这些年，越来越多人向石老请教长寿经验，他总是笑答：“能吃、能睡、能骂人”，简称“三能”。农口很多人知道，“三能”是他的养生名言。能吃能睡，似乎无需多说，倒是“能骂人”颇为费解。

石老文质彬彬，待人宽厚温和，从来不说粗话脏话。在我为他服务的六年间，尽管我办事不机灵，常有疏漏，从来没有训斥，甚至不曾面露不悦之色。有一次去山东，我在省领导送行饭局上喝醉，回到房间就倒在床上，多亏一位省委秘书来敲门，才如仓皇出逃般赶上火车。我吓得上车后醉意全无，静等被训，没想到他嘿嘿一乐，说：“以后都少喝点，我也喝多了。”

石老的“骂人”我多有领教，这种“骂人”不可做通常理解，而别有深意。他给我讲的一个骂人故事是，因为受到排挤而谋求调动，但单位不放，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办法只有“开骂”：每逢开会就提意见，围绕工作提各种不同意见，最后终于被放走。进了九号院以后，为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发展战略等问题，他也照样“骂人”。上至中央领导、中央文件，下到部门领导、地方官员，他都“骂”过。那几年5个1号文件继续出台，他外出作报告时，重点从来不是赞扬，而是指出文件忽略了哪些问题、有哪些不足、农村发展还面临哪些重大挑战。他的“骂人”，是表达独立见解，是建设性批评，是不得其平而鸣。有领导对他“骂人”表示不满，我知道后曾跟他说过，他说：“我才不在乎他们高兴不高兴，这个问题这么重要，他们不重视，是他们的不对，不是我的不对。我就是要到处讲，让大家重视这个问

题”。他讲话常带感情，兴奋时会拍案而起。有一次聊天，我说到“三年自然灾害”，他愀然变色：“什么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年瞎指挥，三年胡折腾，三年头脑发烧！”百岁老人焕发书生意气，令人忍俊不禁。他坚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个人如此，党和国家也如此，所以他要“报忧”。他的自我认同是学者，他认为学者天命是“报忧”，应该积极批评，而不是歌颂逢迎，他从来不写颂圣文章。在石老身上，罕见地演绎了古人的“名士风骨”。

石老很善于做家务，常常是家务主力。那些年他家里没有保姆。他夫人也是一个有文化的老干部，退休后创办了一个民间大学并担任校长，经常比他还忙。石老只要不出差，常常在家里负责买菜做饭，接送外孙上幼儿园。他没有打高尔夫、打网球、游泳等体育爱好，主要运动是走路和做家务。

2015年，石老100岁时，出版了新作，这是离休后第四部著作，也是最后一部著作，定名为“报忧集”。在《报忧集》中，他认为“和而不同”是君子之德，是“报忧”至高境界：“对个人来讲，一辈子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之德，为民为官，凡事都有自己的思想、判断，坦坦荡荡，把自己的意见、想法讲出来，当然，也要学会并坚持尊重别人意见的习惯和作风，活得磊落光明，痛痛快快。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同而不和’，唯长官意志是从，不讲或不敢讲自己的意见，也活得太没有味道了。就一个社会来讲，如果‘和而不同’的人占主导地位，社会上的各种意见能够充分、顺畅地表达、争辩，人人心情舒畅，意气风发，各项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同而不和’者居主导地位，这个社会必然是死气沉沉，最后形成独裁统治，当权者一个人说了算。这样的国家和社会，最后只能走向灭亡，历史的教训太多了。”他还说：“时至今日，报喜不报忧已经不是自欺、欺上、欺人、欺百姓的问题，而是自我暴露并失掉民心的存亡大事”。（《报忧集》第81页，中国林业出版社2015年版）。这是一位政治上历经沧桑、学问上孜孜不倦的百岁老人的肺腑之言，也是国家治理的至理名言。

石老写过若干篇追忆旧友的文章，其中一篇深情回忆著名植物学家侯学煜：“他从来不问中央是什么政策。他通过深入实际，了解情况，独立判断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中央的政策和他的结论一致，自己的结论就点头认可；如果和中央决策不一致，他会再做调查研究，看看是谁错了，错在什么地方。他对我说，如果我的看法错了，我改，如果调查思考的结果还是我的看法正确，那我会提出自己的意见。这番话，让我深深思考，能如此看待中央文件，如此看待自己的思想见解，又能如此酣畅淋漓讲出来的，能有几人？这样的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人多了，就能改变社会风气，整个社会就能畅所欲言，意气风发，社会就能大步前进，建设事业就能快步发展，国家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他还谈到，“侯学煜对修建三峡大坝一直持否定态度，他是生态影响评估专家组的，他愤愤地对我说，我绝不签字，他们就不找我论证了，只找那些同意的去论证。”他这样评价侯学煜：“一辈子讲真话，办实事，独立研究，独立判断，坚持己见，从不苟同，一辈子坦荡磊落，和而不同，实在难能可贵。作为一名学者，他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报忧集》第215页）。这也是石老的自我写照。他瞧不起追名逐利之徒、趋炎附势之辈，他不求闻达于高层，不求闻达于媒体，不求闻达于学界，淡泊自甘，寂寞自守，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在我看来，石老的人生达到了一种化境。

石老走了，在这个寒气袭人的春天，在淫雨霏霏的清明时节，他不愿意为身后事留下任何纷扰，遗体告别仪式也没有举办，悄无声息的走了。但是，他留下了很多。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本文写于2022年4月4日。来源：爱思想网）

林占熺：把“中国草”种在黄河边

朱立杨

到育苗大棚里看菌草长势，在加工车间里讨论工艺，到盐碱地里测土取样，为今年菌草改良盐碱地种植试验提出建议……3月28日9时至17时，78岁的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福建农林大学菌草研究所教授林占熺始终保持工作状态。

上一站是内蒙古。3月25日，林占熺到当地指导开展菌草种植试验示范，一连几天马不停蹄。

“这些年在各地跑，闲不下来。闲下来心里就惦记菌草扶贫、菌草治沙的进展。”当天，林占熺顶着沙尘天气，按计划在石嘴山市惠农区各处调研，协助企业在惠农区打造菌草繁育中心和菌草生态示范基地。

“经实验，2013年种植的菌草到2019年仍可有效固沙。”林占熺表示，黄河流域开展的菌草治理水土流失、治理荒漠化、治理砒砂岩、改良盐碱地等研究示范，取得了一系列创新科研成果。他将推动菌草防风固沙生态治理，菌草生态治理与畜牧业结合，菌草生态治理与农作物保护性耕作，（菌）草、灌、乔综合治理等四种菌草生态治理及产业化发展模式，在惠农区的重度盐碱地上进行有益尝试。

菌草梦，山海情

电视剧《山海情》火了之后，作为剧中人物凌一农的原型，林占熺的故事渐渐被人们熟知。

“更多的人关注扶贫工作，这是好事。”林占熺说，“接下来，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不是另起炉灶，我们要甄选、发展有助于生态振兴的产业，好的经验要总结推广。”

交谈间，林占熺提及最多的是“生态”一词。他坦言：“从事30多年的菌草研究，我的菌草梦说到底就是生态梦。”

1968年，林占熺从福建农学院农学系毕业，被分配至福建三明地区真菌研究所工作，从事食用菌研发和生产。

食用菌作为经济作物生产周期短，见效快。常规的食用菌栽培，需要用木屑作菌棒，播菌种，培育菌类。“20世纪70年代，我们从国外引进了‘段木栽培技术’，也就是用木头、木屑栽培香菇，当时全世界都这么干。但是，种蘑菇，要砍树，种了蘑菇，树木就少了。”林占熺发现，“菌林矛盾”是世界级难题。

1983 年，林占熺随福建省科技扶贫考察团到福建省较早开始香菇栽培的龙岩市长汀县考察，发现砍树种香菇不仅没有让当地人富起来，反而导致生态失衡、土地沙化、悬河高耸。

“生态恶化与贫穷落后是一对‘孪生兄弟’，互为因果，相互叠加。”林占熺说，从那时起，他开始寻找“林木栽培”的替代方案，最终成功“以草代木”，菌草技术应运而生。

1987 年 11 月 6 日，《福建日报》报道了菌草技术，这是菌草技术第一次见诸报端。

1994 年，菌草技术被商务部列为发展中国家实用技术培训项目。1997 年 4 月，在银川召开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将菌草技术列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

当时担任福建省菌草研究所所长的林占熺，与工作队员一起带着 6 箱菌草草种，来到了彭阳县。

彭阳县无霜期不足 6 个月，昼夜温差大，林占熺团队创造性地利用废弃的窑洞栽培食用菌。试种菌草，屡败屡战，艰苦攻关，他们终于利用农作物秸秆培育出适应当地水土的“本土蘑菇”。

问题又来了。一地的成功经验如何在全宁夏推广？怎样让成千上万毫无基础的贫困农户参加菌草食用菌生产并确保脱贫？

为了与南方主产区错开生产季节，林占熺团队一边摸索双孢蘑菇在当地条件下的栽培规律，一边说服群众，进行技术包干。为了观察气候变化对当地蘑菇生长影响的规律，他和同去的技术人员干脆把铺盖搬进菇棚住了下来。

产量上来了，菇的销路在哪里？有群众当着彭阳县县长的面问，菇是种成功了，但这东西牛不吃马不啃怎么办？

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办公室希望林占熺在提供技术的同时，负责包销农户们种出来的蘑菇。林占熺和当地政府签订了包销协议，与团队成员带着菇样北上南下，跑遍了全国主要蘑菇市场，并在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办公室帮助下组织福建销售蘑菇的企业到宁夏帮助解决问题。

一年时间里，西海固的山沟沟、贺兰山下戈壁滩长出的蘑菇被运往全国各地。

“1999 年，我们还在贺兰山下的荒漠地上种下了菌草。”林占熺说，“当时的闽宁村第一次种植菌草成功后进行测产，亩产鲜草 12 吨，是当地玉米产量的 3 倍。老百姓种蘑菇原料问题解决了，更重要的是为荒漠变成绿洲找出一条新路。”

“中国草”，全球种

1992 年，林占熺受邀参加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获得金奖。

1993 年，一位美国农场主在广州专利会上找到林占熺，想以每月 8000 美元的工资邀请林占熺到美国发展。

“这个薪酬是我当时工资的好多倍，但我拒绝了。”林占熺说，“不能有了新技术就给外国人，回头再赚中国人的钱。菌草技术对于改善贫困人口处境的意义更大。”

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为援外项目。菌草也走出国门，成为和平外交的“植物大使”，被外国友人唤作“中国草”。

2005年起，林占熺团队在南非开展菌草技术基地建设与产业化扶贫，在南非夸那尔省建起了32个菌草技术站。为确保菌草技术进村入户收到实效，林占熺对技术流程进行简化，使农户“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

2011年，林占熺率专家组到“千丘之国”卢旺达开展菌草治理水土流失试验示范。试验结果表明，种植巨菌草地的土壤流失量比种植玉米的减少97.05%-98.9%、水流流失量减少80%-91.1%。现在，菌草生态治理已被卢旺达列为国家水土流失治理的重点项目。

“菌草技术已传播到106个国家，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卢旺达等13个国家建立示范基地，为发展中国家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林占熺说，“对外扶贫中，我们把闽宁对口扶贫协作当作一节课来讲。斐济农业部的一位司长听完课以后，非常羡慕我们能有这样的协作政策，也让他们有了把这项技术推广下去的决心。”

2019年12月，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在首都班吉举行的61周年国庆庆典上，为6名中国援中非菌草技术专家颁授国家感谢勋章，表彰他们为中非农业发展所作的贡献。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熺获指挥官勋章，他“子承父业”的女儿林冬梅和另一名专家获军官勋章，另外3名中国专家获骑士勋章。

“国外菌草治沙等经验也进一步回馈了国内工作。”林占熺说，虽然菌草适宜在热带、亚热带、温带生长，但根系很发达，有固沙的功能，他和团队已选育出从黄河上游青海省到下游山东省均适合种植的巨菌草及绿洲系列菌草品种，“希望能在黄河两岸建立菌草生态屏障”。

去年9月8日，菌草产业发展及黄河生态安全屏障建设观摩交流研讨会在石嘴山市举行，80余名科研院所专家及企业界代表出席研讨会。菌草落户石嘴山。

一年时间里，林占熺带着林冬梅多次到永宁县、石嘴山市惠农区、盐池县、固原市等地指导菌草、蘑菇种植。“发源于福建的菌草技术在宁夏推广时，品种与生产模式都需要本土化，由此提出了新的草种选育标准。”林占熺表示，他和团队在宁夏、甘肃、内蒙古、青海等沿黄九省区，以及新疆的不同类型生态脆弱区，建立了16个菌草生态治理和产业发展示范基地，为黄河流域菌草生态治理和扶贫产业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与实践经验。

在林占熺常使用的中国地图上，从黄河上游至入海口，一个个红五星标记着十几个生态治理示范点。让菌草在黄河变清过程中起到作用，是林占熺的下一个目标。

（记者：朱立杨。来源：宁夏日报，2021年03月30日）

根除左倾思潮影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写

郭书田

最近，读了张文博同志转来著名文学理论家王元化著：《我不断反思，为什么“左”的思潮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他指出：“我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反思’一词的，即指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与检讨”。他说：“我痛定思痛开始检讨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他说：“我发现，这种极‘左’的思潮，体现在20世纪初，从西方所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这是一种激进主义。”我读了他这篇文章之后，又重新读了列宁在1920年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加深了对极左思潮的来源及其发展的认识。根据史学家的研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有几个文明古国，创造了光辉的古代文化，多数未能够传承下来，而终断夭折，甚至被消灭，包括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等，唯独中国的文化不仅传承下来，而且有很大的发展，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是在把自己创造的儒家、道家文化与国外传过来的佛家文化融为一体，持续了2000多年之久而经久不衰。著名的国学大师南怀瑾把这种文化归结为：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佛家是“商店”，虽然不是很准确的，但是比较形象。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帝王制，从秦始皇第一位皇帝开始至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先后共有559位皇帝，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皇帝为两类：一类是明君，另一类是昏君。盛时为明君，乱时是昏君。在历朝君臣将相中有左、中、右三类，激进的为“左”，保守的为“右”，不偏不倚的为“中”。“中庸之道”，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清王朝后期，西方世界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牛顿的《力学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出现，引发了思想上的重大启迪，导致了产生社会变革，由封建的帝王制，转为“君主立宪制”，有的直接进入“民主共和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个社会大转型中，中国落后了。西方新兴崛起的成为殖民主义列强，开始向中国伸手，由于中国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与入侵的列强的斗争中，不是割地赔款，就是丧权辱国，使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如何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走什么样的道路，但是，均没有很好的成功。最早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首次提出“君主立宪制”的设想，但参与这项变革的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而康有为最后也成了“保守派”。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以来的封建帝王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但由于各地的军阀对立而割据，有的还当了“儿皇帝”。近代最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是1919年

的“五四运动”，他们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大旗，他们以北京大学为据点，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当时各种主张纷纷的涌现出来，如无政府主义派，实用主义派、民主共和派，特别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的影响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派，还有少数还坚持要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国粹派等等，争论也很激烈，各树一帜。最终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占了上风。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支持下建立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也使中国历史进入了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以苏共为榜样的，而且又是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出现了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以王明、博古为首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使白区的革命损失了100%，苏区的革命损失了90%。毛泽东是这次左倾路线的主要受害者，被迫举行了史无前例的长征，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转败为胜。

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又是以苏共为首的社会主义中的重要成员，由于中国缺乏经验，很自然的以苏联为榜样，并且在他们的援助下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当时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照搬了苏联的全套发展模式。其实从苏联发展的历史看，特别是经过74年的实践而解体，说明是不成功的，也可以说是失败的。十月革命在一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本身是超前跨越的，我们一直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加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战胜了强大的德国法西斯，举世仰慕。随即出现了一系列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建立了以苏联为首的可以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固然有帝国主义实行的“颜色革命”的外部因素，而主要是本国实行了一整套左的制度与政策，解体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是自己的。实事求是的说，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既当了苏联的兄弟，又是这套左倾路线受害者，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幸好在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在他们解体之前，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做了大量纠正与摆脱了他们对中国错误影响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重新屹立于世界的前列。

回顾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里，左的思想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在思想与理论领域的影响更为严重，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批判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乡村思想、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批判邓子恢的小脚女人走路支持“包产到户”思想等等，特别是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的反右倾回潮，1964年的反“形左实右”，1966年开始为期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左倾路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的损失与后果极其严重，也是史无前例的，是中国处于最艰难的一个阶段，这是不容回避的，是不能抹掉的。

中国共产党建立百年来成就辉煌，而两次巨大的左的错误，已在两次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有所反省和检讨。对包括上述左倾错误批判在内都是在反右倾机会主义为核心的，造成一系列冤假错案，绝大多数得到了平反，但对产生这种错误的理论根源并未清除。有两个重大误区，一是认为社会上就存在无产

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也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反映在党内，从而产生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而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也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这场“兴无灭资”的斗争要长期的进行下去，才能够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二是认为社会主义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公有制有两种，在城市里是国家所有制，也就是全民所有制，在农村就是集体所有制。认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中国已经找到了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是人民公社，要有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过渡到生产大队和公社集体所有，由集体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这样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在这种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就会出现“穷过渡”的做法，就是在土地改革农民分得土地后，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被称之为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随后就把土地、劳动力、牲畜、农机具无偿的转为集体所有。这就意味着在农业的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一改造任务已经完成，也就是社会主义在经济战线的革命取得了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还必须在政治战线上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文化大革命”而由此而来。这两个理论的指导造成灾难性后果。特别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中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左是革命的，是方法问题，右是反动的，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宁左勿右。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这种思想比列宁批评的左倾幼稚病有过之而无不及，比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走的更远。

回顾历史，以史为鉴，汲取教训，展望未来，增强信念。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对此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这思想上受“左”的思想错误影响，加以清理，是必要的。

第一，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建党的指导思想，坚定不移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员不可改变的政治立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必须联系实际而不是教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路，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主义，实用主义，更不是贴标签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变质的“马克思主义”，是伪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思想理论体系，最基本的是他的哲学思想，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核心，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必然会犯错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20年”是典型的唯心主义。

第三，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超越的，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改变生产关系，超越经济基础改变上层建筑，也就是“小马拉大车”，“小脚穿大鞋”，必然会遭到挫折甚至于失败，因为这样损害生产力的发展与削弱经济基础。超越了还必须回过头来“补课”。苏联实行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独一无二的公有制、独一无二的分配制度、独一无二的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解。

第四，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最早提出来的建党的基本制度，也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

下的民主，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实践证明，没有民主的集中就会变为专制。反过来没有集中的民主，必然会是乌托邦，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四大民主”（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大串连），是最大也是最典型的乌托邦。

第五，政治生活中的自由与纪律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没有自由就会窒息活力，反过来没有纪律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党员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按纪律而来，而不是对错误也盲目服从，应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听不进不同意见，就会变成一言堂，甚至产生盲目的个人迷信。

第六，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以及清除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是检验作为执政党的党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是否合格的基本标尺，清除那些“权为己所用，利为己所谋”的腐败分子，是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不能姑息手软。

第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犯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包括知名度很高的名人或政府领导人，只不过功与过的程度不同而已，有的功大于过，也有过大于功，不能因功大而忽视过，也不能因过而否定功。在评价时以事实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东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论衡·艺增》：“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是很公正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憚”。

第八，“谦受益，满招损”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党的八大开幕式，毛泽东致词中有一句名言“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是党的好传统。作为执政党，也就是掌权的党，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需要严以律己，发扬这个好传统，实践证明，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以其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的现象屡禁不止，是危害党执政地位的大敌，应从严力戒。

第九，对党忠诚是对党员的基本要求，即表现在具有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又要表现在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中，能够敢于反映真实情况、讲真话、实事求是的原则。真正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为实，这是党的基本思想路线。我们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不动摇，要体现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

第十，为此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有效的贯彻执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党员，既要廉洁从政，当好“清官”，又要防止容易滋生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等不良作风，当好有作为的“好官”。二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每个基层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每位干部要发挥骨干带头作用，每位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总体来说，从源头清除极“左”的思想理论及其产生的错误影响，是党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旗帜在思想战线上最深刻的“拨乱反正”与革命，我们要下定决心把它解决好，为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2022年5月）

原农业部老部长何康一份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

张蓝水

北京西山森林公园有一处烈士纪念地，纪念潜伏台湾、1950年6月10日被中国国民党杀害于中国台北的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位烈士。《新华每日电讯》曾撰文重点介绍了吴石烈士的事迹。我在2021年8月18日《北京社区报》“历史文萃”栏目看到了以《“红色密使”的“家国密码”“潜伏者”的传奇人生》为题摘发的这篇文章。文章还披露了原农业部老部长何康一些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

—

吴石是中国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并未加入中国共产党，却甘愿为共产党工作。他送出的大量秘密核心情报，加速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特别是渡江战役关键节点提供的核心情报，为解放战争战事的加速结束作出了特殊贡献。

在阅读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引发我特别关注的，还有我们原农业部老部长何康的革命事迹。1949年3月，住在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康，如约接待了一位来访的特殊客人。这就是当时国防部史政局的中将局长吴石先生。他送到何康手里的是国民党军队《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此图细化到军队团一级的番号。国民党《史政工作条例》规定，核心军事资料都要送史政局备案。在上海、福州、广州、香港，吴石冒着生命危险，把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全军军备部署图》《京沪杭军事部署》《京沪杭失陷后的全国作战部署》等核心情报及时送给中共地下组织，为南京、上海、福州的解放作出了特殊贡献。

二

吴石（1894—1950年）毕业于河北保定军官学校、后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回国后任职于国民革命军参谋本部。48岁晋阶陆军中将。吴石同中共高层的接触交往始于1937年。真正促使吴石转变的是他对中国国民党的彻底失望。

在政治倾向转变过程中，吴石深受与其有“生死之交”的何遂先生（辛亥革命元老）的影响。何遂与吴石是福州同乡。抗日战争初期，何遂与中共发生关系。他不是中共党员，但其子何康及其他2子1女1媳都是中共地下党员。1947年，中共中央上海局开始联络、争取吴石，4月吴石与共产党“确立了某种联系”。之后，吴石开始与何康单线联系。

1949年8月吴石从福州飞往台湾。在台期间，吴石升任参谋次长，曾两度只身赴香港，寻找中共党组织，与中共在港情报机构建立起联系，继续向中共提供台湾重要情报，为祖国统一殚精竭虑。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每周六下午4时化身前往吴公馆取情报，经秘密渠道从香港传到内地。

三

何康（1923年2月—2021年7月）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广西大学农学院毕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国家农业部门的领导工作，1983—1990年任农业部部长。他是我国天然橡胶事业奠基人，1993年度世界粮食奖获得者，为我国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现代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从本文很高兴地得知，何遂、何康一家两代人为全国解放“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特别是何康与吴石单线联系，为解放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特此向只知何康对农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之人，提供一份何康在解放战争期间为革命所作贡献的珍贵资料。

（作者：经济日报高级编辑，2021年10月11日）

只有人、地、村整体联动，才能破乡村振兴这个局

刘守英

导读：

2022年2月22日，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部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这也是继去年“一号文件”之后，再次聚焦乡村振兴。

在去年的“一号文件”发布后，中国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权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接受《经济观察报》独家专访，给出了他对于“乡村振兴”路径的探索——改革以农民工最终要回村为前提的城市化模式，是乡村振兴的前提。针对今年的“一号文件”，刘守英教授再次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在去年思考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聚焦农村，明确提出：通过农村“公”“私”空间界分、向带头“私”侵“公”的强者“开刀”，“人”“地”“村”整体联动，才能破乡村振兴这个局。

一、乡村振兴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乡村无序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讲了回家乡（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看到的乡村的情况，后来我也去了其他一些地方，调研了一些比较传统的农业县，包括江西的余江县，思考现在这个局面下，乡村振兴到底怎么去破题。

乡村的整个环境不能再恶化下去。

现在乡村环境面临的最大问题在哪儿？进到乡村，发现的第一个乱象就是乱盖房——有的房子盖很大，有的房子盖起来是空的、没人住；另外，有些在外面挣了钱的人、有权势的人，拼命去挤占乡村的公共空间，把路给占掉，把原来的菜地给占掉，然后大家互相效仿，都去占。

这个情况，表面上是因为乡村没有地来给盖房——有一种观点说，现在农村大家拼命去盖房，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量村庄不再批宅基地。这个情况也存在，但问题在于，农民“一户一宅”是不管你分家还是不分家，你总有一处宅基地，不能说你立一家就给你一块宅基地。如果村庄无限制的只要谁要盖房就给谁批宅基地，就会面临：一旦农民分家，就可以申请宅基地；只要有钱，就可以把盖房地皮占得非常之大。

从农村住房这件事，看到的现象是什么？

第一，有钱人把房子盖得非常大，可能比原来宅基地的面积更大，就变成了违建。原来是一户一宅，现在变成“超占”或者“违法占地”，农民攀比式盖房。

第二，没钱的或者已经出去了的人、已经在城市买房落下来的人，他们不打算再在农村落下根来，就不怎么修房子、任其破落。

第三，一些农村房子盖得跟小白宫一样、鸟巢似的，整个农村的住房，变成他们显示财富、显示家庭在乡村地位的工具。

第四，乱占地——大量菜地被占用盖房，大量乡村公共空间和公共建筑被占、被据为私有。过去政策规定了“一户一宅（基地）”，村组织应该有管理的权限，国土管理也规定要对超占和违法占地有处置，为什么会解决不了？

第五，当整个村子已经脚都伸不进去——整个公共空间都被私人占掉了，大量农民就会选择沿着路盖房。这实际就变成占耕地、占更大的公共空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方面中国会有大量的废村、空心村，但同时又不断有耕地和公共空间被占。

这要有应对的办法。我们现有的制度是保证“一户一宅”，但光靠这个行不行？所以，乡村的这种无序建设，可能是乡村振兴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二、乡村无序建设的根源是缺乏公私空间界分

乡村的这种无序，表面上是盖房的无序，背后根源实际上是“公”“私”空间没有明确界分。

农村“私”的空间，是农民的住房和分到的宅基地；“公”的空间是除每一家住房以外的——比如路、菜地这些乡村公共空间。这些公共空间被占，实际上是整个乡村“公”“私”两个领域界分不明确导致的。如果这两个空间没有明确的界分，必然会出现“私”去侵占“公”，尤其是势力大一点的“私”——比如乡村有权力的大家族，或者在外面挣了钱的人，或者家族里有人在外边有官职。当有钱人和有权人去侵占“公”的部分，大家就会效仿——你有权占“公”的部分盖大房子，我哪怕没钱，也去占“公”的部分盖个厕所、搞个猪圈，再不济，占块地去搞个菜园也行。

像在余江，当时搞宅改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情况是：一个自然村里可能盖几十个厕所，都是盖在“公”的空间里——大家不断地去侵占“公”的部分，来扩大他“私”的部分的空间，把乡村里任何“公”的空间都给占掉了。在余江，有村委会前面的路口都被有势力的人盖房子给堵死了。

现在我们进到乡村，首先看到的这些乱象，是乡村衰败的最主要表征，如果这件事不解决，乡村就没有看相。没有看相，花再大的精力去搞乡村振兴，就只能是打造一些样板——打造样板很简单，就是投多少钱、造多少房子、修多少路，建文化礼堂等等；但核心的是乡村秩序，是“公”“私”空间之间的界分一定要有明确的制度安排。

三、乡村公私空间界分的制度安排

“公”“私”空间界分的制度安排，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私”的部分怎么保证。

保证“私”的部分，“一户一宅（基地）”的制度肯定要保证，这是保障乡村农民的基本居住权。对此，我的观点是：

第一、农民原有没分家的“一户一宅”，是基础的“一户一宅”权利，是历史传承下来的，应无偿提供；每一户初始宅基地的分配权要保证公平，以一个时点切断，在这个时点之前无偿提供的“一户一宅”，就不要去折腾它。

第二，现在有分家的——比如说两个孩子，一家在原来的老宅，第二家需要新宅就要申请新的宅基地，对于新户再申请宅基地，只要是集体组织的成员，要给他初始的获得权，保障他“一户一宅”的权利，但要从无偿变为有偿。因为如果继续无偿的话，乡村建房占地会无限扩张。

第三，每户的宅基地面积一定要卡死。无论是老户还是新户，在乡村获得的宅基地就是那么多；而不能是我家钱多、权力大，就获得的多——这是导致乡村不公平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我90年代到越南，看到一栋一栋往上建的房子，原因就是每个农民获得的是平均面积的宅基地。

第四，未来乡村不能再以原来的小自然村为单位配置宅基地，而要把宅基地所有权的分配和未来整个村落适度集聚的需求衔接起来，以相对集聚的这种村落来配置宅基地——比如三个自然村合成一个相对比较集聚的村落，来做乡镇振兴的基点。因为未来乡村是需要有适当的集聚（当然，也不能把农民整个都集聚在城市社区那种聚集区）。

在农耕文明时期，传统村落是以自然村为聚落的，宅基地的分配也是以自然村为单位；但这些年大量农民往路边盖房屋，很重要的原因是村落的功能在发生变化——已经不是原来那种完全为了乡村农业生产、为了赶牛、看水、离田更近。因此，宅基地的配置，要跟整个乡村聚落的这种变化对应起来。

那么，集聚区的宅基地所有权从哪来？从原来的三个自然村重新调整过来——每个自然村各出一部分相对应的宅基地，来给新的聚落提供宅基地的所有权，但不在原来的自然村配每户的宅基地。这样一来，新户慢慢就往新聚集的村落去建房了。老户看到这个情况，也可以自愿申请到新的聚落。

当然，很多人家在老自然村房子刚盖，就不要动它了，让它慢慢地这样演化，形成新的乡村聚落。这些新的聚落，是未来整个乡村的新村落，它改变了原来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村落形态，适应了现在人口流动、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适应老人相对集聚，包括村庄的文化场所，慢慢就有了。

与宅基地所有权重新分配相对应的，是村落的规划——新村落的半径多大、落到哪，就几个村一起商量，然后由村落自主做规划；但国土系统要管它的规模、土地的使用、管它的乱占。

把规则定下来，按规则来，乡村就变得有序了，村落的形态就变了：原来是两三百户人家散落在一个自然村落；现在是在一个相对集聚的村落——但也不是有些地方在农村搞的城市社区，也不是大的合村并居，而是渐进式的：新户先到新村，老户要改建、新建房屋，也要到新村，现在老村有些不错的房屋先别动，慢慢演变。这样，村落的形态就开始改变，乡村就会出现大量“公”的空间。

为什么讲“公”和“私”的空间界分非常重要，“私”的空间要落下来？因为“私”的空间不解决，“公”的空间就没法有效实施——你用大量地探照灯、开着摩托车去查，没用的，乡里乡俗，村干部去查，怎么查？

“私”落下来以后，乡村“公”的空间就出来了——原来两三个自然村合并形成新的集聚村落，相对原来散落的三个自然村，就会有很大面积的乡村集体建设用地节约出来，可以用做“公”的空间，是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民村集体可用的、可以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的地方——做一些经济活动，搞一些产业、副业（比如菜园，就不用去占耕地了），搞一些乡村文化设施、娱乐活动。这样，就改变了以前过于分散的村落形态，有生产生活文化精神的公共空间，乡村就开始美起来了。

原来村落它不美，是因为整个乡村基本全被盖成房子了——意味着乡村只有“私”，没有任何“公”的空间，而且“私”的部分不断以家庭为单位侵占“公”的部分，整个乡村就没有公共生活了，乡村也就没有活力、死掉了。

四、整顿乡村无序，从强者“开刀”

那么乡村公私空间界分，谁来干这件事？

现在难在哪？难的是动不了——在“私”侵“公”的过程中，权力、资本、能人、外面回来的人，谁能谁就干，谁有钱谁就干，使整个老村变成了一个毒瘤。如何启动对这种无序状态的改变？怎么动这一刀？我是觉得，不是从弱者开始，而是从强者开始、向强者“开刀”。

这需要制度设计：村、集体组织的干部带头，把自己多余侵占的“公”的部分干掉——不管张三李

四王五，不管当官的还是外边回来的，有多占的部分，都切掉。这就是江西余江县干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把“私”侵“公”的部分、多余的“公”的部分清理掉。

“私”侵“公”，现在很多地方是罚款、收费，没用的。你能收多少钱？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公”的部分拉出来——乡村强者用权力、用资本、用家族势力带头侵占的大量“公”的空间得拉出来。余江非常重要的经验是在这：让外面回来的能人结合乡村干部，两者一起来撬动，把村庄变得有序：“私”的部分不能这么无限——因为“私”的部分必须保证公平，不能因为“私”侵“公”导致的不公平，最后把乡村搅乱了。

对外面回来的人而言，他不希望村庄变得如此无序。因为出去的人，面子上要有光——在外面有了些钱，回到村庄一片破败、变成自己很唾弃的地方，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他们有动力把乡村整得像个样、变成“诗和远方”。

外面回来的人带头——由有能力和有钱的人带头，乡村干部来实施，动强者的奶酪，然后其他人就跟随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当然，不可能所有的村都这么去弄，但我们要给村庄这种从无序到有序，提供一个可选的路径让它去做。强者如果不动，乡村不会有序。这跟历史上是一样的——历史上，乡绅是一个贤达，乡村就是有序的；乡绅是个恶绅，乡村就麻烦了。

概括起来就是：第一，乡村“公”和“私”的空间界分开始慢慢形成，这是如何动这一个奶酪。这里面也包括我前面讲的规则——不能占耕地，要把整个村庄的规模锁定，把新村落的位置锁定，规划跟上，把老村落节约出来的土地慢慢变成公共空间，这个过程需要时间。第二，怎么变化，我讲的是一个动强者的逻辑——削平强者的奶酪，来解决村里“私”侵“公”的问题。第三，新的村落慢慢出来，公共空间逐渐形成——这个村落就是我们未来乡村振兴的基点。

五、未来新村落图景：从衰败到村活

新聚集村落这个基点，跟传统村落最大的差别在哪儿？

第一，传统村落是死的，老死不相往来、人和地紧密结合，村庄是一个锁定人、地、村的基本单位。现在的村落，相对集聚以后，功能就开始变了。一是这个村落就不完全是一个只是连接农业的村落了——它跟农业也还相关，但农业的半径扩大了，它跟农业的连接变弱；二是乡村的很多非农经济活动会出现——中国传统的乡村有大量副业、手工业，不是一个纯农业的经济形态，有“公”的空间以后，农民就会去“折腾”，乡村的经济活动就会变得多样化，包括服务业等很多传统的经济活动慢慢就会开始复兴。

第二，很重要的是，家庭和家庭之间的连接可以增加、开始聚落化。传统的中国村落，在人不走的情况下，家族跟家族之间、农户跟农户之间是很紧密的，但现在大量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走了，只留下老人。形成新的村庄聚落以后，在整个人口迁移和变迁已经导致的乡村聚落的这种疏远后，连接会开始密集起来。

第三，老人之间的联系增强。现在农村最大的问题是，老人之间没法互相照应——这家有一个老人，隔壁可能就没老人，再隔两家才有一个老人。但在相对聚集的新村聚落，老人跟老人之间相对集中，就有一个集聚交流的场所，交流的方便程度增加，而不用像现在这样从第一组跑到第三组，往往跑去以后没碰到其他老人，又很失落地回到自己的黑屋子里面。现在农村老龄化以后，如果不解决村落的集聚问

题，完全靠养老院养老是不现实的——既负担不了那么多钱，农民也没有用货币化方式解决养老的习惯。

第四，新乡村聚落成为一个文化空间。村庄集聚之后，政府配一些公共文化设施，老人可以去看老戏，在一起晒太阳、聊天——农民的文化需求是这个层面的，而不是配图书室。

第五、这些新村庄聚落、文化场所，也是未来乡村的历史记忆空间——每个村的村史、村庄名人、村庄重要事件，就能记录、体现。在外面的农二代农三代，不会忘掉他自己的根在乡村——所以我们现在老讲乡愁；但如果整个村落的功能不能让外面的人对乡村有寄托，只是清明烧香、春节回去一下，时间一长，村庄慢慢就会被抛弃、遗忘。

第六，是诗和远方。现在不少人回老家是住宾馆；未来的乡村形态变体面、文化空间、精神空间都出来以后，出去的人留在乡村的房子就不会破败下去了，他每年回来就跟度假一样，一年可能回个四五次，整个乡村就变成诗和远方，就有人气了。有人气以后，有交往、交流、交换，市场活动、经济活动就会多起来。现在村庄为什么没有人气？因为大家只出不进，大家不愿意去投入，出去的人过年回来放个鞭炮就走了。

我这次去余江，特别有意思，那些老乡镇跟原来不一样了——外面来了厂子，老人在老乡镇上做一些从这些工厂接来的活；原来那些粮管所都废了，现在突然变成卖肉卖菜的。

第七，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现在我们的乡村所有的要素只往外走，未来整个村落的节点是真正能实现城乡互动的。一、本村的人开始集聚；二、外出的本村人也会更多的回到乡村来，就会带来人气；三、非本村的外地人会到村里来待一待、休闲一下——旅游者到乡村来看景观，城市小孩的乡村的教育等等。像贵州湄潭，夏天会有将近 3000 重庆人来消暑。很多城市的老人，夏天也会在乡村住个把月。

总而言之，从解决村落的无序、公私空间问题，从而解决未来村庄的聚落问题，村庄的支点就开始变了，带来乡村从原来的衰败到活起来——从乡村的无序到有序开始，从乡村的公共和私人空间的重新区分开始。

六、人活：人力资本提升、观念革新

乡村怎么活起来？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企业家的进入——我们现在老是说“资本下乡”，这是不准确的。核心应该是乡村怎么培养企业家、怎么有企业家愿意来乡村“折腾”、企业家怎么在乡村进行要素的组合。因为有了企业家，就意味着有想法的人来了，这个地方进行了人的改造。乡村的人，我老讲“换人”——不是说把农民都给搬走，而是换想法、换主体。乡村是长出来东西，而不是规划出来。

企业家是整个乡村振兴最重要的主体。企业家为什么都要在北京干？他是找到有发展有机会的地方就会去的，要让他们在乡村有机会。当乡村新的聚落形成，就会有一些在外面做事的本村人回来做一些经济活动——那些在外面做了一些产业、挣到钱的人，觉得现在村落也挺美的，就可能回来搞一些事业，甚至把厂子移回来。另外，城镇的人去村里多了，也会创造一些经济活动，乡村里的企业家就会生长出来。外面想在乡村做一些事的企业家，也会进来。

企业家来乡村以后，原来的人也会被带动、会慢慢接上企业需求的技能，人力资本提升、观念改变——等于农民也换人了，换了眼界、脑子、行为方式、规则。原来乡村落后、愚昧、守旧的这些东西，就慢慢被改掉了。

这样的变化，是我们在整个制度安排上一定要解决乡村“公”“私”空间界分。

讲完了“人活”，第二点就是“人走”。这是一个基本规律，乡村不需要那么多人。中国目前是一

个回村的城市化模式，但在回村的城市化模式下，乡村振兴是没法弄的。

“人走”还是按代际来，枢纽是农二代融在城市。农二代未来回村，是村变成诗和远方，他的主体、居住、经济活动，一定在要在城市，生活方式一定是城市化，一定要变成城里人。如果农二代又跟农一代一样，回乡村种地、盖房，又变成地地道道的农民，中国的乡村振兴永远也完成不了，现代化就麻烦了。

这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一定要保障农二代在城市的基本权利——居住权、工作权，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农二代有变成城里人的权利。

乡村“人走”的这个逻辑是：农二代回村，就相当于农一代把农二代又拉回来，农三代又不得不给拉回来，最后还是一个以乡村为归属的模式。如果是这个模式，乡村的人口少不了，人际关系变不了，人村关系变不了，农民城市化也变不了，市民化也变不了。

所以，农二代作为一个枢纽，一定要有融到城市的基本权利。农二代融到城市以后，整个闭环就变了：农三代自然就落到城市了，农一代就变成两栖的——肯定是落到乡村，但一年可能有一定的时间在城市，这样农一代往城市去的路径也打通了。

七、中国农业的一场革命

村活、人活之后，是“业”的问题。“业”是随着村和人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村没有变、人没有变，“业”就没有变的空间。因为中国农业的结构特点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农民创造百分之几的GDP（农业占比），“业”怎么有希望？

这背后的根子是人没变，出去的人还是要回来，所以人和地的关系就不可能变，人和村的关系也不可能变，村庄的公共空间就出不来。

如果人和村变以后，农二代农三代跟土地之间的关系就脱掉了，土地流转和集中就能实现，乡村就变成了一个相对集聚的村落，其他的地就可以整理连片，搞农业最难破的人地关系问题就破掉了，农业经营规模小的问题就可以破掉了，高质量的农田、农业现代化就有可能了。但对农民来讲，破的是他的耕作权，原有村民实际上还享有两个特权：一是在新村落的宅基地分配权——只有村民才有资格获得宅基地的初始分配；二是只有本村农民才有承包地的承包权。农民有了这两个特权以后，宅基地已经集中了，耕地也由新的耕作者去种。

针对农业小规模的问题，政府现在破的办法是搞补贴，搞种植大户，其实不合算的。因为农村的“人”“地”“村”关系没打破，出去的人的地给周围的亲戚邻居种，农业经营的契约关系形成不了，经营者就培养不出来，“地”也拿不出来。

因为破人和破村带来的破地，地就可以相对集中。这背后是权属关系的变化：第一，原来的农户承包权成为“田底权”，经营权成为“田面权”——农民就像古代的“不在地主”一样，拥有“田底权”，“田面”权转让给耕作者，耕作者就可以扩大土地规模了。另外，就是对“田面权”的权利保障——使用、收益、转让、流转、抵押等这些权利都有了，耕作者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经营者。此外，村庄原来会有一些公共部分，可以作为集体的公用土地流转给新的经营者，或者当农地使用，或者做其他的加工业，这样一二三产就都出现了，乡村的产业就活了。

乡村产业活了以后，经营者就变了。现在农村老龄化很严峻，老人就种那么一点地，年轻人也不回来种，农业就变成一个搞生计的农业，农业就肯定没希望。但地的形态变化以后，会带来农地经营方式、

经营者的变化，这对整个中国的农业来讲，就是一场革命。

原来农业现代化最大的障碍，是缺少进行农业生产要素组合的主体。因为单位土地的回报太低——那么小块的地，还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成本太高，没法进行要素组合。乡镇的公共空间没有解放，也没法去搞其他的经济活动。

但当有了公共空间，就有人愿意搞各种经济活动，带来了各种想法；农地集中以后，就能够以土地规模化为基础进行农业的生产要素组合、组织新的农民。大量经济活动的复杂化，是企业家来做的——企业规模化以后，农产品会面向城市需求，质量、口味多样化，也会进行复杂加工，带来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提升、农业质量监测品控的变化，带来农业各个环节服务能力的提升，也会带来农业合作和组合的变化，整个农业就变了，实际上是带来整个中国农业的一种产业革命。这个产业革命实际上是以企业家进到乡村、进行农业的要素组合为特性的农业的工业化过程，也就是农业的产业革命。有了农业的产业革命，农业技术进步就有用武之地了。

农业的产业革命发生在哪？第一是一二三产打通，提高农业的经济复杂程度，农村产业的多样化；第二农业的产业革命是农业本身的变革，核心是企业家进行的农业生产要素新的组合，降低成本、提高规模报酬，而不简单是土地规模化，也不简单是机械化。而推动整个要素组合的关键，是人地村变化带来的突破小规模土地制度的瓶颈。

总而言之，如果不解决乡村“公”“私”空间界分问题，乡村“公”的空间部分出不来，那什么事都干不了。人、地、村，要做一个系统整体考虑、联动，才能破中国现在人、地、村的恶性循环。农业有搞头了，中国乡村振兴的“业”就有了根基。反过来讲，有“业”，就有乡村振兴——乡村就是一个新的形态，新的经济组织、新的经营方式和脱胎换骨的革命。

八、乡村秩序再造

乡村未来是否振兴，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乡村的秩序：在这些新的形态下，乡村的治理模式一定要跟上。

中国现在的乡村治理有两条线：既有自上而下的行政治理，也有传统的乡村治理那一套，但这两条线作用发挥的都不好。原因就是村本身没有达到振兴的形态。

在乡村振兴的形态下，乡村治理未来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一、乡村的人不完全是本地人了；二、乡村的功能也不是原来的功能了；三、乡村的形态也不是原来的形态。如何新的形态、新的功能、新的业态、新的人的组合上进行有效治理，以新的村落形态和不同的人、不同的经济活动，形成面对乡村未来的变化，这是要破解的问题。

未来有效的办法，可以是传统的乡村治理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治理这两者的结合，来解决新的村落形态下不同主体对村庄治理的需求。这样，中国的乡村，就既是振兴的，也是有序的；乡村就既是活的，又是诗和远方。

当然，乡村振兴要有耐心，急不得，起码按10年、20年左右来规划，哪怕50年才能搞定，但关键是要把路径想明白、路子要搞对——一定要打通乡村的循环，找到活的路径、突破口，不能没有任何思路的去搞乡村振兴。

（本文由刘守英教授口述，李佩珊、刘玉海整理。来源：经济观察报，2022年3月4日）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农村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及各研究所
发：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郭书田
副 主 编：辛 梅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www.moagov.cn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邮 编：100125 100810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